

宋黎明 著

神父的新装

——利玛窦在中国[1582 - 1610]



南京大学出版社

神父的新装

——利玛窦在中国 [1582 - 1610]

宋黎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 / 宋黎明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305-08283-2

I. ①神… II. ①宋… III. ①利玛窦(1552—1610)
—人物研究 IV. ①B979.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481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
著 者 宋黎明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26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283-2
定 价 4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珍藏室

宋黎明，195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78年至1988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并教书，1988年至1989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科学系进修，随后作为独立学者在罗马生活至今。

自序

显而易见，“神父的新装”脱胎于“皇帝的新装”。然而，它们是两件不同的新装：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装”，其实是一丝不挂，简直有伤风化；本书主角利玛窦神父的新装，却是严严实实，长袍兼有高帽。无论如何，与童话中的那个男孩一样，笔者看到的新装也与众不同。在众人纷纷夸奖皇帝的新装如何高贵、漂亮时，那个童话中的男孩直言皇帝为赤身裸体；学界普遍认为1595年春利玛窦出韶州时，穿的是“儒服”或“儒衣冠”，即直裰加四方平定巾，笔者却要说利玛窦戴的不是方巾，而是东坡巾。

1595年后利玛窦头戴方巾，堪称学界的集体错觉。从利玛窦本人的描述，从迄今可见的利玛窦所有画像，均可判断利玛窦戴的是东坡巾。学界对方巾的错觉，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利玛窦身份的错觉，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利玛窦在1595年从“西僧”摇身一变为“西儒”，即类似孔门之“儒士”，而“儒士”的打扮当为直裰加方巾，即《儒林外史》中一再出现的“阔服方巾”，所以利玛窦的头巾便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方巾。学界对于利玛窦身份的错觉，部分原因是源于中文的“儒”和意大利文的 *letterato*。艾儒略曾说瞿太素在韶州“劝利子服儒服”，李之藻也称利玛窦在韶州“蓄发称儒”，这显然是利玛窦为“儒士”的重要证据。另外，利玛窦本人谈到自己在韶州的变化时用了意大利文 *letterato*，它可直译为“文人”，利玛窦也用这个词指儒教，这也成为利玛窦为“儒士”的佐证。

无论如何，假使利玛窦的新身份果真是“儒士”，他就应该佩戴方巾，但

是，利玛窦出韶州后偏偏未戴方巾，其“儒士”身份便值得怀疑，支持“儒士”之说的名词也需重新考察。先看中文的“儒”字，它可指孔门之儒，也可泛指文人，甚至指术士，如《说文·人部》云：“儒，术士之称。”《天主实义》载有“西儒”，但它泛指西方学者；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和李之藻《混盖通宪图说自序》中也有“儒者”，但也与儒教无关。再看意大利文“letterato”，在表示“儒教”的同时，利玛窦也用它来指佛教居士或士人，如称南京的著名佛教居士焦竑和李贽为两个伟大的“letterati”。在利玛窦的概念中，letterato 应该相当于中文的“士”，即《天主实义》中一问一答的“西士”和“中士”。因此，无论是中文的“儒”还是意大利文的“letterato”都未必指“儒士”，而因为利玛窦戴上与“儒士”身份不符的东坡巾，故可以判断 1595 年出韶州后的利玛窦不是“儒士”。值得注意的是，1595 年出韶州时利玛窦特别铸造了一个意大利新词 *predicatore letterato*，意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德礼贤正确考证为“道人”。“道人”含义十分丰富，其中有佛教居士和江湖术士之意，而从利玛窦日后的表现看，他的新身份就是居士和术士。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居士与术士的通常打扮为直裰加东坡巾。

1595 年利玛窦出韶州后的身份是居士和术士，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前他曾以“儒士”身份出现在韶州。耶稣会士初入肇庆时，身份为“天竺僧”，衣衫当为法衣袈裟或便服直裰，头上或戴僧帽或光头。然而，1588 年成为中国传教团实际负责人后，利玛窦便开始试探变化。1592 年春汤显祖在韶州见利玛窦时称之为“子”、“生”，在此前后利玛窦南雄之行中一直以轿代步，这两个场合利玛窦是如何穿戴的呢？可以肯定的是，1594 年秋范礼安已经批准在华耶稣会士易服改名，利玛窦公开放弃和尚称谓而让随从称他“先生”，同时他头上也戴上一顶高帽，既非僧帽，也非东坡巾，当为方巾。这意味着从 1594 年秋到 1595 年春，利玛窦试图扮演的角色是阔服方巾的“儒士”，艾儒略所谓“服儒服”以及李之藻所谓“蓄发称儒”，很可能指这个短暂的半年。

换言之，利玛窦的易服改名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在 1594 年秋，另一次是在 1595 年春，学界似乎混淆了这两次变化，并用第一次短暂的变化取代第二次长期的变化。

毋庸置疑，1595 年出韶州后的利玛窦一直是穿戴直裰和东坡巾，身份为居士和术士，而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儒教采取了敌视的立场。1595 年从南京进南昌前利玛窦曾做一梦，欲以天主教摧毁“中国古教”(*la sua legge antica, l'antica religione di questo regno*)；不久后致家人函中，他更将中国三教比作古希腊神话中多头的勒耳那怪蛇 (*l'idra lernia*)，当斩尽杀绝；李贽《与友人书》透露“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也是利玛窦反孔的佐证。但在 1603 年“妖书案”前后，北京城政治气氛大变，佛教遭到迫害，利玛窦为自保而开始疏远佛教，并与儒教套近乎，《天主实义》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然而，利玛窦自称的“褒儒贬佛”与徐光启后来总结的“易佛补儒”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利玛窦的穿戴还是直裰加东坡巾，其术士传奇依旧，而居士色彩仅仅减弱而已。事实上，在利玛窦晚年以及身后，依然有人称他为“西僧”、“番僧”等，数百年后甚至被钟表匠人尊为“利玛窦菩萨”。

总而言之，笔者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利玛窦新装，也看到新装下一个崭新的利玛窦。本书展示的利玛窦也许对许多人显得陌生，笔者相信这个利玛窦更接近历史真实。本书不是利玛窦的标准传记，如同副标题“利玛窦在中国 (1582—1610)”表明的那样，本书主要讲述并评价利玛窦在中国的故事。前五章分别叙述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五个城市的经历，最后两章则分别阐述利玛窦在文化和宗教两个方面的功过是非。本书也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点探讨一些新发现，对于大家熟知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因此，本书七章中有许多考证文字，散杂其中的十个附录更类似于考证性的专题研究，大到利玛窦在华身份、易服改名的原因，小到第一个在华天主堂的名称、人名、地名乃至货币单位等，均在考证之列。这些考证文字势必影响

本书的叙事节奏并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但有好奇心特别是有考证癖的读者也许乐在其中。

本书从利玛窦 1588 年起草的教皇致万历皇帝的“国书”写起，因为它是利玛窦在中国舞台成为主角的标志，而在此之前他不过是罗明坚的助手，也因为利玛窦在“国书”中指称耶稣会士为“上僧”和“儒僧”，流露出他求变的最初冲动。“上僧”和“儒僧”即高级的有文化的和尚，这是耶稣会士的特点之一，与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特别注重文化与科学的训练，是传教士中名副其实的“儒僧”。利玛窦出韶州时铸造的新词“有文化的传道人（predicatore letterato）”，其灵感显然来自“儒僧”，但还原到中文则成为“道人”，后来利玛窦更从“道人”衍变出“修士”和“会士”两个新词。将“儒僧”与其衍生词“修士”做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儒僧”是有文化的僧人，而“修士”则是修道的士人或僧人中的文人，侧重点有所不同，反映了利玛窦世俗化和贵族化的良苦用心。远东耶稣会士均以“僧”的身份出现，澳门、日本均不例外，范礼安破格同意在华耶稣会士易服改名，仅仅因为利玛窦声称和尚在中国没有威望和地位，故不利于传教。范礼安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戴上东坡巾的利玛窦一段时间内干脆不传教，其后也很少传教，大部分时间用于研习和传播“数学”。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堪称著作等身，唯一的神学著作《天主实义》却成为日后数百年纷争的根源。本书充分肯定利玛窦在文化科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他在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借用“儒僧”之说，利玛窦堪称“大儒”、“小僧”。

目 录

自 序	1
1 一封“国书”的背后	1
一、沉睡的“国书”	1
二、“天竺僧”敲中国门	11
三、崇信塔与僊花寺	18
附一 僊花寺：仙花寺还是迁华寺？	25
四、“天主”的诞生	30
五、传教之初：“大事”与“小事”	36
附二 “数学 (matematica)”与象数	44
六、访华使团：阳谋与阴谋	49
2 韶州之变	54
一、刘继文下逐客令	54
二、从南华寺到光孝寺	59
三、利玛窦与瞿太素	64
附三 汤显祖逢利玛窦于韶州	69
四、南雄之行与“夜盗案”	74
附四 一份未刊手稿的初步研究	78
五、范礼安批准易服改名	84

六、“外国道人”出韶州	89
附五 “道人”与“修士”	94
3 南昌安“家”	99
一、从吉安到南京	99
二、南京吃闭门羹	103
三、南昌城落脚	109
四、书院、寺院与“家”	114
附六 易服改名原因考	119
五、《交友论》与其他	124
4 从南京到北京	131
一、第一次闯北京	131
二、“美丽的骗局”	136
三、李贽与三淮和尚	143
四、马堂临清“刁难”记	150
五、“大西洋陪臣”进方物	156
5 北京岁月	162
一、走出会同馆	162
二、“妖书案”前后	169
三、《天主实义》与《天主教要》	174
四、“飘然自儒风”	181
五、《畸人十篇》与《辩学遗牍》	187
附七 《辩学遗牍》作者重考	192
六、晚年回忆录	197
七、利玛窦之死	203

6 遗产之一：“利玛窦菩萨”	210
一、自鸣钟与通天塔	210
二、三棱镜与黄白术	215
三、天主画像与利玛窦像	220
四、西书、西琴及其他	227
附八 谁将望远镜带入中国？	231
五、地图：世界与中国	236
附九 Descrizione, 地图史的一把钥匙	242
六、球体：天与地	248
七、文化交流：东与西	256
7 遗产之二：“利玛窦规矩”	262
一、再适应的“游戏”	262
二、文字野狐禅	268
三、“剪羊毛”与“播种”	273
四、利玛窦与龙华民	278
附十 僧德清赠诗龙华民	283
五、“礼仪问题”与“利玛窦规矩”	288
利玛窦年表	295
参考书目举要	301
后 记	306

1

一封“国书”的背后

一、沉睡的“国书”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块明代木板，上面刻着罗马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国书”全文如下：

太僧天主教门都僧皇哂哂第五顿首拜

大明国国主御座下：伏以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生厕名世间，绍天主之正脉，处修善念，躬率礼拜教门，兼宣经戒等事，惟愿天下人，自知有大父母，不可不隆孝，以尊奉（奉）天主，传其圣教，显其名号。闻外邦多有味天主事理，眩于异端；生居天竺，惻然动念，是以不憚委任之勤，跋涉之劳，锱铢之费，特选笃实博雅儒僧，遍游四方，谕扬天主正教，授以真经。其经乃天主亲制，以惠后人，当佩服而恪守之也。往谕之后，又申饬銜（御）旨，欲其钦奉厥职，随所经历之地，察彼之教门，果与天主相合，始为正道；间有好崇邪说，即善为劝诱，以归吾教，毋使砢硌得以混玉哉。生见鄙，他无所求，窃幸推广慈悲，普济世人，俾仓（苍）生戴齿之伦，无不敬恭天主，谨遵规戒，则冥冥之中，降以禎

祥，同登仙境，不致悞(误)陷迷途，死堕苦狱，而生之夙愿慰矣。

先年曾委数僧，游至盛国，闻君明臣良，相与翊景运，文风丕振，苍赤宁生，经书家喻户晓，猗欤称慕隆矣。惟天主上帝，其事未解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咱哪嚕、咱哪、哩哪、咱哪，德行颇优，儒文宏博，在喇嘛天主名字寺发卷，并旧住三僧，二德、玛赛、安东，代生趋拜足下，外具敝国土物为贽，薄将鄙诚。其物第一件乃天主真经一卷，盖足下膺宝，历以抚黎元，必为天主宠佑。烦望口诵心维，俯垂清照，虽道隔云泥(泥)，不俨若近聆清诲乎？所属臣庶，亦希为宣谕。推仁柔远，毋曰诞妄，则幸甚幸甚。又望足下不弃贱壤，爰赐硕才杰士，泛航而来，使生常瞻懿范，方显真诚相爱，倘符愚愿，四僧给有割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则生之荷恩，宁有涯哉。敬修寸墨，伏祈

台照不宣

都僧皇晒哪再顿首

天主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晒师哪第五年三月天竺国京师书立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沉睡数百年后，这封“国书”于1901年首次公之于世；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书目》中按照原版印制，将其附于书末，但没有翻译成西文，也没有考订其作者。^①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913年出版《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时，重新影印了这个文件。汾屠立神父不通汉语，故求助于法国耶稣会士兼汉学家戴遂

① 考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书目》(Henri Cordier,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e et X^e siècle*, Paris 1901), 第67页。考狄(1849—1925), 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目录学家、珍本收藏家, 世界汉学权威刊物《通报》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

良 (Leon Wieger)。戴遂良自称对罗明坚的写作风格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国书”的文字“很不准确、很特别”,并判断“国书”的作者为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①另一耶稣会士、利玛窦研究权威德礼贤 (Pasquale M. D'Elia) 则认为“国书”的文字“非常优雅、华丽”,并肯定其作者为利玛窦 (Matteo Ricci)。^②

长期以来,在华耶稣会研究中存在着重利玛窦而轻罗明坚的趋势,这在“国书”考证上也可窥一斑。罗明坚比利玛窦早两年学习中国官话,难以想象在 1590 年之前,利玛窦的汉语水平已经比罗明坚高出一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罗明坚还是利玛窦,都没有能力写出这样优美的文字。它反映的不是耶稣会士的写作能力,而是肇庆某文人的捉刀水准。另一方面,与优雅的文字相比,“国书”的抄写笔迹则显得笨拙,疑似出自外国人或者担任传教士翻译的澳门华人之手。因此,判断“国书”作者的关键线索在于内容。显而易见,这封“国书”不乏佛教色彩,教皇自称为“太僧天主教门都僧皇”,而且“生居天竺”,罗马城也被称为“天竺国京师”,这都让人联想起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天竺僧”之名进入中国的故事。但是,罗明坚在华期间“天竺僧”的称谓始终如一,而这封“国书”却出现变化的痕迹,如耶稣会士被称为“上僧”或“儒僧”,这是利玛窦易服改名的初步冲动,1595 年出韶州后的新称谓“道人” (predicatore letterato, 有文化的传道人) 当源于“儒僧”;有趣的是,“国书”也

① 汾屠立《利玛窦历史著作集》(P. Tacchi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Macerata, 1911—1913), 第 2 卷, 第 493—494 页, 注 1。戴遂良 (Leon Wieger, 1856—1933), 法国耶稣会士, 曾长期在中国献县传教, 著述颇丰。

② 德礼贤《利玛窦资料》[*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sotto il patrocinio della Reale Accademia d'Italia, Edizione nazionale delle opere edite e inedite di Matteo Ricci, 3 voll.;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第 1 卷, 第 249 页, 注 5。“非常优雅、华丽”是利玛窦本人对于“国书”文字的评价。《利玛窦资料》, 第 1 卷, 第 249 页)

大主上帝其事未鮮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啗嚼嚼實哩諾嗎的哩德行頗
優儒文宏博在

噉所天主名字寺發卷並舊住三僧二德瑪寶安東

代生趙拜足下外具敵國土物為贊薄將辭誠其物
第一件乃

天主真經一卷蓋

足下膺寶曆以撫黎元必也

天二龍佑順望口誦心維俯察清照雖道隔雲泥不儼若近聆清諭乎所

屬臣庶亦希為乞諭推仁系遠好日誕妄則幸甚耳臣

又望

足下不棄賤裝爰賜碩才傑士泛航而來使生常瞻懿範
方顯真誠相愛倘符慈願四僧給有剝牒沿途送以華其
行則生之

荷恩寧有涯哉敬備寸墨伏祈

台照不宣

晉貝

都僧皇哇師祈再頌首

天主生自一千五百九十年吧師師第五年三月天竺國京師書之

利瑪竇以教皇名义给万历皇帝的“国书”。“国书”原版木刻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大明國國主御座下

太僧天主教門都僧皇啞啞第五項首拜
伏以

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生二厠名世間紹

天主之正脉虔脩善念躬率禮拜教門薰宣經戒等事惟願天下

人自知有

大父母不可不隆孝以尊奉

天主傳其聖教顯其名號聞外邦多有昧

天主事理眩于異端生居天竺惻然動念是以不憚委任之勸駿駛之

勞鎔鍊之費特選篤實博雅儒僧徧遊四万論揚

天主正教授以真經其經乃

天主親製以惠後人當佩服而恪守之也往諭之後又申飭街市款其

欽奉厥職隨所經歷之地察彼之教門果與

天主相合始為正道間有好崇邪說即善為勸誘以歸吾教毋使砥

硯得以混玉哉生見鄙他無所求竊幸推廣慈悲普濟

世人俾含生戴齒之倫無不敬恭

天主謹遵規戒則冥冥之中降以禎祥同登仙覺不致悞陷迷途死墮苦

微而生之夙願慰矣先年曾委數僧遊至

盛國聞居明巨良相與翔景運文風丕振蒼赤寧生經書

家喻戶曉倚歛稱恭隆矣惟

让“太僧天主教门都僧皇”对中国皇帝一再自称为“生”，教皇成为利玛窦本人世俗化的先驱。^①“国书”中还有“惟天主上帝”句，这是耶稣会士笔下首次出现“上帝”字样，是利玛窦为“国书”作者的重要证据。进入肇庆之初，罗明坚受到当地人陈氏的启发，将拉丁文 Deus（意大利文 Dio）翻译为“天主”，他的第一部天主教中文著作即名为《天主实录》；二十多年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则宣称“天主即华言之上帝”，与“惟天主上帝”异曲同工。

根据这封“国书”，教皇使团将由七人组成，其中“上僧”四人为咱哪噜、啞喲、哩喲、吗啞啞。戴遂良按照中文发音将他们复原为意大利文的 Pietro, Paolo, Lino 和 Mattia，但查遍耶稣会名册，并无此四位高人，汾屠立猜测他们可能属于天主教其他较小的宗派。^②然而，首先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始终掌握着在华传教的主导权，并力图避免其他宗派染指，故难以想象来自欧洲的四名使团成员会是清一色的其他宗派的人员。事实上，按照范礼安的计划，这个使团不但排斥非耶稣会神父，而且排斥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他在 1588 年 11 月 10 日致总会长函中指出，教皇使团的欧洲成员应为四人，他们统统是耶稣会士，特别是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会士，无西班牙籍会士。^③因此，这四人当为虚名，Pietro 和 Paolo 是耶稣最重要的弟子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名字，其随意性可想而知。采取虚名制意味着教廷和耶稣会可临时选择四名使团人员，让他们用 Pietro, Paolo, Lino 和 Mattia 之名入华。这种冒名顶替的把戏，当年罗明坚和帕内拉（Panela）首次进入肇庆就曾表演过，而如果他们有人因某种原因需要留下，也可将错就错或改名换姓，如同后来

① 教皇以“生”自称，并称中国皇帝为“足下”，均不得体。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古人称呼简质，如足下之称，率施于尊贵者。盖不能自达，因其足下执事之人以上达也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今平交相谓，亦称阁下，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

② 《利玛窦历史著作集》，第 2 卷，第 495 页，注 1。

③ 《利玛窦资料》，第 1 卷，第 248 页，注 1。